

从涪陵到梁庄：比较视野下的“非虚构”中国叙事

沈 闪

内容提要 《江城》与《中国在梁庄》是“非虚构”中国叙事的两个典型文本，前者注重对涪陵小城精彩瞬间的捕捉，而后者倾向于对梁庄这一乡村废墟的展示。很大程度上，异域闯入者彼得·海斯勒敏锐的“地方感”与返乡者梁鸿的“童年经验”等写作立场与观察视角的不同导致了文本阅读的差异，并在叙述策略上分别呈现出客观“显示”与主观“讲述”之别。“重返”抑或“逃离”，彼得·海斯勒与梁鸿各自给出了不一样的答案。涪陵于彼得·海斯勒而言，已具有精神乌托邦的意味，为其“回老家”提供了极大可能性。与此相反，面对深陷从物质到精神全面崩盘危机的梁庄，梁鸿终将选择离去。

关键词 《江城》；《中国在梁庄》；非虚构；叙事

《江城》和《中国在梁庄》有很多共同点。但更重要的是两个文本之间的差异，因不同的写作立场、叙事策略、叙事旨向而构筑现代性转型场域中不一样的乡村中国面貌。本文将从两部作品的差异入手，将视线聚焦于作为外来闯入者彼得·海斯勒眼里的中国与作为返乡者梁鸿笔下的中国有何不同。这些差异是通过什么方式表现出来的？它们背后又有怎样深刻的内涵？导致了什么样的结果？

一 精彩瞬间的捕捉与乡村废墟的展示

2001年，英文版 *River Town: Two Years on the Yangtze* 在美国面世，成为认识中国的一个重要窗口。2012年2月，其中译本《江城》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江城》讲述的是1996—1998年间彼得·海斯勒作为一名“美中友好志愿者”，在四川偏远小城涪陵师专（现更名为长江师范学院）任教时所看到的风景、邂逅的人、遭遇的事。今天看来，它之所以让人印象深刻，主要是因为彼得·海斯勒作为外来者的特殊身份。他不仅看到了更为丰富多彩的世界，也听到了更多来自普通人的声音。此文本值得关注的另外一处在于作者所讲述的涪陵

生活，新鲜、深邃、生猛。彼得·海斯勒捕捉到了一个个美妙的瞬间、生动的细节，不管是奔腾的长江、精耕细作的绿色山峦，还是底层小人物的日常生活，皆为书中所勾勒的精彩篇章。整座城市和小城里的人们满怀生命的激情与希望。

2010年9月，《梁庄》首次刊载于《人民文学》上。晚些时候更名为《中国在梁庄》，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作品广获赞誉，成为研究“非虚构写作”绕不过去的典型文本。“我”以“梁庄女儿”的身份，记录下近30年来中国边缘乡村——梁庄的生存镜像：“我”的族人在臭气熏天、污染严重的河流之旁建立起各自的新楼房，只顾经济效益而忽视生态环境的砖厂最终让乡亲们遭殃、官员们牟利，因挖沙而越来越深的橡胶坝河段成为吞噬梁庄百姓生命的恶魔。教书育人的梁庄小学摇身一变成为发家致富的养猪场，村庄教育、文化氛围行将消散。离乡出走的理想青年并未在城市找到安身立命之所，梦想成为最坏的东西；而固守家园的昔日少年玩伴变成了一个又一个“闰土”。现实积弊太深以致政策落实困难，乡村政治陷入被围困的僵局。乡民们的道德危机触目惊心，挣扎在被世界遗忘的角落里。为提高村庄文化素质而搭建的文化茶馆和民间戏台

子,却少有人问津。梁庄被贴上“荒芜”“衰颓”“崩塌”的标签,梁庄人生存之上的精神撕裂与信仰迷失触手可及。

涪陵与梁庄多有相似之处,位处边远狭小地带,闭塞落后。两本书中所讲述的内容多有重叠交叉,比如农民、流动人口、土地、教育、文化传统与精神道德等都一一关涉。可见,涪陵小城和梁庄生活大体属于同一个中国乡土叙事图景,但仔细体察却发现两个文本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非虚构”中国叙述样貌。在彼得·海斯勒那里,虽然涪陵拥挤、肮脏、贫穷,可山峦苍翠、江河悠闲、生活怡然;而梁鸿笔下的梁庄千疮百孔,与废墟无二,令人惊诧、唏嘘、震颤。如果说《中国在梁庄》写出了典型与共性,写出了20世纪后半期乡村中国社会的变迁史与心灵史,写出了“最近三十年‘被’消灭的四十万个村庄的缩影”^[1];那么,《江城》则将我们熟视无睹、习焉不察的小城镇生活陌生化、疏离化。因此,《中国在梁庄》与《江城》给人的阅读体验恰恰相反,前者因熟悉而让人产生共鸣——“这写的不就是我的家乡吗”,而后者则因陌生而让人疑窦丛生——“这是我所生活的涪陵吗”。与之相伴随的问题是,这些不同产生的原因何在?在其背后,是否代表着不一样的写作立场、叙述策略与乡土中国的建构方式?

二 异域闯入者的“地方感”与本土返乡者的“童年经验”

不管是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基希、“三斯”、韩丁、杰克·贝尔登,还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费正清、史景迁,抑或是21世纪的加藤嘉一等人的著述,大多从宏观着眼且关注中国的上层政治动态、历史架构与文化生态。我们在对其博识称赞之时,也感到底层生活经验的被遮蔽。显然,彼得·海斯勒对此有一定的认知:“就我读到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晚期国外媒体刊载的中国报道和故事,我大都不太喜欢。我觉得它们对这个国家的理解很肤浅,对中国人的描写也非常干瘪。在那些故事中,一切都显得灰暗而忧伤,而涪陵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幽默、生机和活力根本就找不到。我希望自己写的跟他们有所不同。”^[2]他坦言:“怎么写中国,我有

我的想法。”^[3]因写作需要,笔者曾与远在埃及的彼得·海斯勒取得联系。在一次邮件回复中,他进一步具体深化了上述“想法”:“我注意到关于中国的外国人书籍很少传达强烈的地方感(sense of place)。这是因为几乎所有的外国人都住在中国的大城市,比如北京、上海、广州或者其他任何大城市。在一本书里,你是不可能真正地捕捉到这些大地方,通常作为外国人你很可能被自己周围的环境所吓倒。所以这些书描述了其他的东西。但涪陵是不一样的。在那个时期,尽管我是外国人,但我可以去一些小地方。涪陵足够小,我可以彻底探索它。在两年的时间里,我几乎走遍了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我看到很多乡村景色。我有强烈的地方感。当然,当时中国的大部分地区仍然是乡村,大多数中国人都有强烈的地方感。我可以从我的学生以及他们书写自己家乡的方式来分辨、来了解。所以我想写一本书,其中的地方是突出的。我希望读者看到涪陵。”^[4]

作者这种强烈的“地方感”,使得他去关注涪陵的地理景观,去感知涪陵人生存的活生生的细节,去探寻涪陵的每一个角落,去了解每一个被隐藏的秘密。而彼得·海斯勒本人与生俱来的好奇心加剧了他的“地方感”,《江城》实际上是真实的生活经验细密呈现的一种尝试与努力。自然,涪陵师专周边的大小城镇、乡村于初来乍到的彼特·海斯勒而言,处处充满着新奇。但另一方面,强烈的“地方感”又使其极为重视微不足道的细节与瞬间,比如出租车司机每分钟平均按喇叭37次,比如涪陵城的台阶、涪陵人的腿,再比如学生晨读的朗朗书声。这些琐碎的细节、倏忽而逝的瞬间正是我们平时所忽略的,它们组合成一幅幅看似陌生但却无比真实的中国乡村图景。《江城》也正因此而让读者得以重新认识那些被忽视的,甚至从来都不曾关注过的人和事。

《中国在梁庄》中,梁鸿的身份稍显复杂。既有前20年生活在梁庄的童年记忆和经验,同时又深深地打上了在大城市生活的烙印。童年时期,梁鸿常因被忽视而蛰居在一个非常封闭的环境,但也意外地获得“一个自由冥想的空间”,“这种空间促使你对自然界,对自己的内心有更多的探索”^[5]。童年生活虽然短暂,但那些体验都“构成了他(她)的最初的生活环境和人生遭际,形成了他(她)的

短短的却是重要的经历”^[6]。梁鸿作为长期远离故乡的游子，由于内心的思乡之情得不到纾解，形成一种眷恋家园的心理定势。那么，重返梁庄，也就有了几分寻根、审视的意味。梁庄是过去与现在、时间与空间的叠加。这就能理解梁鸿为何花费大量笔墨，来追忆童年时代的土地、树木、村落、坑塘、河流，寻绎往日的玩伴、长辈、恩师。

弗洛伊德认为：“在所谓的最早童年记忆中，我们所保留的并不是真正的记忆痕迹而却是后来对它的修改。这种修改后来可能受到了各种心理力量的影响。因此，个人的‘童年记忆’一般获得了‘掩蔽记忆’的意义。”^[7]因而梁鸿很可能给故乡穿上一件古雅而美好、轻薄而朦胧的纱衣，昔日故园梁庄在记忆中被改造、被诗化，实现了华丽转身。每每读及《中国在梁庄》中关于童年故乡的文字，总会体悟到作者眼中的柔光、笔下的温情。那是贫瘠年代封闭的生存环境之下，对无比敞开的内心世界的一种折射。

然而，当童年经验与社会现实存在严重落差时，“自己人”梁鸿通过回望故乡便找到了感情宣泄的突破口。社会现实越残酷，童年记忆愈显美好。她在童年记忆与现实生存镜像之间徘徊、纠结、缠绕而无法抽离，呈现出难以言说的撕裂之痛。加之，梁鸿在童年阶段所经受的苦难，如物质匮乏、母亲早逝、精神压抑等缺失性经验，从根本上奠定了她悲情的主观感受趋向。表现在文本中，“那个批判的、略嫌伤感的倾听者，一上来就设定好了，自始至终没有改变。与此相应，小说中选择的人物、记录的事件大多是负面的”^[8]。此种悲情使之更倾向于关注“千疮百孔”的梁庄，这反过来又加剧了作者自身“撕裂”的疼痛。

彼得·海斯勒更多的是站在涪陵外部、作为初来者进行描述，尽管他也有批判、对比与反思，但依然觉得涪陵小城每天所发生的一切都非常有趣。他并不认为涪陵的生活悲惨，更不觉得此处的生活不值一提。彼得·海斯勒始终都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理解，而非寻找差异，使得《江城》拥有了一股温柔的力量。不可否认，彼得·海斯勒眼界受到一定限制；而正是因其所知有限，他对涪陵发生的一切没有过多评判和审视，更多的是对生活细节的

呈现与记录。毫无中国经验的彼得·海斯勒，从零开始，以时光与经验来累积他对乡土中国的印象。

作为曾经长期生活在梁庄的一份子，梁鸿的眼光自然比彼得·海斯勒更宏阔，内在的对比反思亦更加地鲜明。“我希望，通过我的眼睛，使村庄的过去与现在、村庄所经历的欢乐与痛苦、村庄所承受的悲伤，慢慢浮出历史的地表。由此，透视当代社会变迁中乡村的情感心理、文化状况和物理形态，中国当代的政治经济改革、现代性追求与中国乡村之间的关系。”^[9]这也就是为何梁鸿将2010年的单行本命名为《中国在梁庄》的原因。她不只是写梁庄，更是通过梁庄反思中国乡村当下的现状、未来的出路。《中国在梁庄》既饱含着“梁庄女儿”梁鸿的怀旧情绪和痛彻情感，又笼罩着身为归乡知识分子梁鸿的审视批判与思辨感悟。

相较而言，彼得·海斯勒的写作立场不像梁鸿那么明晰、坚定。他并不认为《江城》是一本关于中国的书，《江城》更像是献给他自己的一本书，所以彼得·海斯勒才能不止一次地表露心迹，宣称这座长江边的小城——涪陵，是他在中国的“老家”。

三 客观“显示”与主观“讲述”

写作立场和观察视角的不同，表现在文本上即写作修辞的差异，这也直接给我们带来了完全不同的阅读体验。如果说《江城》带给人的感受是舒缓静谧，那么《中国在梁庄》给予人更多的则是震撼颤动。同是记录急速变动之中的乡土中国，《江城》更多的是细节经验或瞬间场景的“显示”，《中国在梁庄》则更多的是写作主体饱含深情的“讲述”。

所谓“讲述”是一种“直接而专断的修辞法”，作者以明确的判断代替读者的推想；而“显示”，则指“故事被不加评价地表现出来，使读者处于没有明确评价来指导的境地”^[10]。此处的判断或评价，即作者的声音。这里有两种不同的情况。其一，作者的声音完全消弭，也就是“零度写作”。其二，作者的声音较为微弱，尚不能凌驾于整个文本之上。《江城》二者兼之，比如在描述中国人对交通事故的围观时，此处彼得·海斯勒作为旁观者只是一名记录员，他所做的仅是陈述事实，“既不对它作任何改变，也不对

它作任何缩减”^[11]。另一方面，作者并没有完全将自我的声音隐匿。三峡大坝的修建，在他看来就是极其危险的违背自然之举。但与此同时，对涪陵人所持有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表现出极大的同情与理解，认为他们还有别的事情需要担心。

中国读者常因此而批评书中彼得·海斯勒观点或判断的缺乏。他在一次访谈中，对此作了回应：“（中国）作者都倾向于证明自己的观点或是急于解决手头的问题。但是我的方式更贴近美国的传统，类似人类学。我会报道一个地点或者个人的细节，尝试用有趣的方式把他们记录下来。我自然也会添上自己相关的看法，但是这些个人观点并不凌驾全文。”^[12]正是这一“并不凌驾”的自觉，使得叙述较为舒缓自如，就像那反复描绘的长江水一样，绵远悠长。

《中国在梁庄》则不同。表面上看，梁鸿为倾听者、记录者，梁庄人才是讲述者。可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作品里虽然有许多梁庄人在说话，但他们的声音常常被有意识地裁剪而归纳到某一类的问题里。他们的讲述仿佛只是在证明某一种问题的存在。”^[13]梁鸿以直接而专断的“讲述”，以明确的批评与审视引领着读者的思考与判断，凸显出强大的主体性和控制力。比如，面对一直躲避留守儿童困境问题的芝婶，“我反复启发父子分离、家庭割裂、情感伤害所带给孩子的那种痛苦和悲剧感（这一启发甚至有点卑鄙）”^[14]。这和鲁迅《故乡》里自上而下启蒙者的写作姿态几乎没什么两样。她后来在《出梁庄记》中也意识到这一点。再如，面对生活不如意的闺中密友菊秀，作者这样分析：“是什么使菊秀好像在过一种错位的生活？母亲的蔑视、哥哥的嘲笑并不是没有道理，她太不务实，尤其是在异乡异地，这样一种虚幻的情感使她的一切选择都显得不切实际。”^[15]上述带有明显倾向性的话语体现一个知识分子良知式的愤激话语的强势介入，一方面遮蔽并淹没了梁庄人自己的声音，另一方面很大程度上也影响着读者的判断。

在“显示”与“讲述”的背后，是叙述策略的根本差异。《江城》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对彼得·海斯勒两年涪陵生活的追溯，二是对那时那地精彩瞬间的捕获。前者是第一人称“我”的叙事，而后者为第二人称“你”与第三人称“他”“他们”的

交叉叙事。第一、第二、第三人称的穿插运用，一是使作者的声音分散在文本的各个章节中并得以弱化。《江城》每个章节的第一部分大多是以第一人称“我”直陈对当时中国某些不合理现象的评价，而第二部分则类似小品文，大多是对插旗山、白鹤梁、乌江、长江、白山坪等地理景观的描摹。二是使作者所扮演的角色在旁观者美国“彼得·海斯勒”和参与者中国“何伟”间碰撞、转换并最终融于一体。这种亲疏结合的交叉叙事方式，带来了“看”与“被看”的双重观察视野。首先，初来乍到的彼得·海斯勒扮演了一个观察者。短短两年，他“看”到了贫穷、烂路和慢船，“看”到了涪陵小城从何而来、去往何处。而同时作为涪陵所见不多的外国人，彼得·海斯勒也处于被人密切关注的核心位置。作者尤其提到进城练习汉语时给当地人造成的轰动，而这一“被围观”带给他的却是痛苦和困扰。一方面作者进入了“学生食家”老板黄小强、李佳丽、高明等当地人的私人生活，另一方面当地人也同样进入了作者的生命。当地人与彼得·海斯勒并未处于相互对立的状态，二者构成了对话与交流，“看”与“被看”逐渐将被遮蔽的文本呈现在读者面前。

《中国在梁庄》与之不同。虽然书中不少篇幅是梁庄人的口述，尽管其中还夹杂着第三人称叙事，但文本之外总有一个声音在引领着问题，指引着访谈的走向。那么，这个声音就是第一人称“我”的叙述。一定程度上而言，写作者一开始就预设了较为悲情的感伤基调，因而，设置的问题具有主观倾向性，左右着梁庄村民的呈现方式。“我”仿若高高在上、手拿遥控器的观看者，从头至尾都处于主导的中心位置。相反，以老贵叔、五奶奶、毅志、清道哥、明太爷等为代表的梁庄人则是“被围观”的对象。而且，他们的诉说范围也是非常受限的。换言之，“我”抛出问题，梁庄人作答，双方并无多少眼神的对视与心灵的交流，访问者“我”与被访问者梁庄村民尚未建立起平等的对话关系。如此一来，非虚构文本便在“我”所掌控的问题讲述中完成。就像有人所指摘的：“《梁庄》的非虚构叙述显然昭示了另一个被遮蔽的潜文本存在。作者‘我’一次次进入不同村人的私人生活，相反，那些村人却很少进入作者的生活，表现出反向叙述上的有意

遮蔽或者删除，再次印证‘事实’（fact）与‘虚构’（fiction）的区分本身经常值得怀疑。另外，作者苦心营造的谈话语境在引导/窥视的功利诉求下力求全景展现，使读者几乎看到梁庄的每一类人，却看不到梁庄人和人之间的自然关系和彼此间的动力影响。”^[16]这样一种单向的叙述策略，并不能全面展现梁庄真实的生存图景。实际上，梁鸿有很强的自省意识。她对于先验的意识形态是非常警惕的，也曾试图将其抛弃，只不过在现实操作中出现了很大的偏离。而且这一“偏离”并不单单是梁鸿自己的问题，亦是当下“非虚构写作”如何客观呈现所面临的共同困境。

四 “逃离”抑或“重返”

《中国在梁庄》与《江城》，分别从内部和外部建构了两个不同的乡土中国图景。此后，梁鸿最终选择回归书斋、逃离故土；而彼得·海斯勒则反复强调江城是自己在中国的“老家”，祈愿再次重返。那么，二者不同道路选择的背后有何用意？

我们曾将2010年第9期《人民文学》上的《梁庄》与之后第一版单行本《中国在梁庄》相比较，发现短短几月间不少内容都做了调整。其中，结尾由最初的“再见，故乡！再见，妈妈！有您在我会回来。”^[17]而更改为“再见，妈妈！再见，故乡！”^[18]。此处的修改离不开句式整饬等形式因素的影响，但除此之外，这一“再见”的呼喊与离去的决绝想必有更深层的考量。《出梁庄记》同样也是以“我终将离梁庄而去”^[19]宣告完结，这是巧合吗？梁鸿的离开，是否意味着她完成了自己的“返乡之旅”？为何今天的知识分子返乡者始终逃脱不开20世纪20年代鲁迅先生《故乡》里的“离—归来—再离去”模式？

能否重返梁庄需考虑两个问题。其一，若干年后在城乡合并大潮中梁庄是否仍存在？生命的存在亟需自然物的依托来呈现。童年时代的坑塘被填、树木被砍、河流污染、人事涣散，情感所在地“梁庄”正在被拆解并重新组装。所谓的生活与文化共同体“梁庄”便在此过程中逐渐面目全非。其二，如果梁庄还在，作者敢不敢回去？能不能回去？诚

然，身体的返乡因经济增长而变得越来越容易，可精神的返乡却愈来愈艰难。作者理想的乡村图景依然为“田园诗”的生活，“但这种生活，并非传统文化中的‘老死不相往来’、‘泥屋瓦房’式的田园诗，而是那种能够珍惜、尊重民族古老传统，尊重人心和朴素情感方式的生活。它尊重大地，尊重泥土，尊重来自于大地之中的生命”^[20]。然而，以“梁庄”为代表的中国乡村正处于从物质到精神全面崩盘的漩涡之中，从根本上决定了重返故土的不可能。因此，我们也就理解梁鸿在接受凤凰网采访时所表露的“不敢回去”的心声。

涪陵对彼得·海斯勒的意义在于，这是他开始认识中国的地方，也是让他成为一个作家的地方。与《甲骨文》《寻路中国》相比，《江城》投射了作者太多的个人经历和情感体悟。更为妥当地说，是以他为主角的一本回忆录。在后两本著作中“我”仅仅为勾勒全篇的线索，不再是主角。在涪陵师专，他所扮演的角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比如学会了说中文，结交了像黄小强、神父、廖老师、阿尔伯特等知心朋友，对中国的历史与政治亦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虽然彼得·海斯勒因来自于意识形态对立的美国，而在政治上被孤立；但同时中国传统文化却对他起了不容小觑的同化作用，使他能够逐渐融入当地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因此短短两年间，美国“彼得·海斯勒”便实现了向中国“何伟”的整体蜕变，获得了新生。在此之上，涪陵也就有了成为中国“何伟”“老家”的可能性。以上都奠定了他长期在中国生活的基础，也为其后来创作《甲骨文》和《寻路中国》提供了主观条件。《江城》所书写的不止是农民、小生产者等与苦难的抗争，更有作者同样自强不息的身影。彼得·海斯勒重返涪陵的渴望，与其说是对以往生活的怀念，不如说是与过去自我对话的企盼，以此寻求精神与情感的双重慰藉。那么，涪陵于彼得·海斯勒也就有了几分精神乌托邦的意味。他的每一次重返，都象征着一次精神的回归。即使昔日场景不再，那也不会产生太大问题。毕竟，20世纪90年代那座一切都处在变化边缘的江边小城已被鲜活地记录下来。尽管重返江城的作者，发现涪陵和梁庄一样都发生了剧变，记忆中的涪陵一去不复返，但更多的体验是精

神的同在。在这一层面上，他确实与梁鸿不同。

“逃离”抑或“重返”，除却他们自身的原因之外，多少和中美两国文化差异有关。“中国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儒家文化的影响一直占主导地位，受其影响的文化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基础。”^[21]自古以来，中国即有“礼”“忠”“恕”“孝”的传统。可自现代化转型以来，原来的集体、宗族观念越来越不受重视，古时的优良文化传统愈来愈不堪一击。切痛的感悟不由得让人思索，未来的乡土中国将何去何从？梁鸿精神返乡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源自包括梁庄在内的中国乡村所代表的民族独特的生命方式、情感方式被现代化浪潮所湮没。为梁庄立传的梁鸿以“离去”的姿态将此问题抛之于世，因而“离开”不应局限地只看做知识分子软弱性的体现，它还代表着一种向上谏言的尝试与努力。虽然作者一再否认，但梁庄显然带有当代乡土中国问题的典型性与代表性。美国强调个人意识，信奉个人奋斗法则。《江城》中不管是农民，还是老师、小创业者，在他们身上都能看到积极昂扬的精神状态。悲情、哀痛则是《梁庄》的主旋律。很大程度上，美国文化与宗教信仰息息相关。彼得·海斯勒自小在虔诚的基督教家庭长大，祖父及父亲曾一度是传教士。幼时宗教氛围潜移默化的影响是其个人生存的根基，基督教义使其更为达观，也更能接受涪陵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巨变。与“昨天”相比，由移民组成的美国更为注重“明天”的发展。如果说梁鸿将更多的视线放在过去，那么彼得·海斯勒则更关心涪陵的未来。因为他无法预测，这座城市还将经历怎样的巨变。“重返”涪陵对彼得·海斯勒而言，便在此意义上有了可能。

《中国在梁庄》和《江城》都是关于乡土中国图景建构的文本，因而，我们不能狭隘地评判哪个中国面貌更客观或者更准确。本文立足于典型个案的比较研究，从四个方面借以彰显当代中国乡土叙事的两种角度和两种模式，以期深化对“非虚构”叙事的不同主体心态及建构方式的认识，引发对中国当代乡土问题及中国未来走向的关注。通过对异域闯入者与本土返乡者在叙事心态、姿态和语态上的区别，引入对中美文化差异以及对乡土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反思，从而在中西比较视域中凸显了精神返

乡问题的普遍性及中国传统乡土文化所面临的危机。在此基础上，或可为中国当下的“非虚构写作”研究，提供一个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的新视角和新方法。

[1] [9] [14] [15] [18] 梁鸿：《中国在梁庄》，封底温铁军推荐语，前言第2页，第61页，第95页，第208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2] [3] 彼得·海斯勒：《江城》“中文版序”，李雪顺译，第6—7页，第6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

[4] 参见彼得·海斯勒先生在2018年7月1日邮件中的回复。

[5] 梁鸿、张丽军：《梁庄：乡土中国的现在与未来——梁鸿访谈录》，《百家评论》2015年第2期。

[6] 童庆炳：《作家的童年经验及其对创作的影响》，《文学评论》1993年第4期。

[7] 弗洛伊德：《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车文博主编：《弗洛伊德主义原著选辑》（上卷），第105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8] 李云雷等：《〈梁庄〉讨论会纪要》，《南方文坛》2011年第1期。

[10] W·C·布斯：《小说修辞学》，华明、胡苏晓、周宪译，第8页，第1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11] 伍蠡甫、胡经之：《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中册，第20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12] 南香红、魏传举编辑：《何伟：非虚构写作让人着迷的地方，正是因为它不能编故事》，搜狐2017年9月25日，http://www.sohu.com/a/194399290_817062。

[13] 张莉：《非虚构写作与想象乡土中国的方法——以〈妇女闲聊录〉、〈中国在梁庄〉为例》，《文艺研究》2016年第6期。

[16] 杨俊蕾：《复调下的精神寻绎与终结——兼谈〈梁庄〉的非虚构叙述旨向》，《南方文坛》2011年第1期。

[17] 梁鸿：《梁庄》，《人民文学》2010年第9期。

[19] 梁鸿：《出梁庄记》，第305页，花城出版社2013年版。

[20] 靳晓燕：《归乡，找寻精神家园——〈中国在梁庄〉作者梁鸿访谈》，《光明日报》2011年1月18日。

[21] 饶纪红：《跨文化交际中的中美文化差异》，《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

[作者单位：湖南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刘艳